

2

英國及加勒比海區 一段簡短而痛苦的歷史

英國與加勒比海地區：三幕劇

英國與加勒比海地區的故事是一齣三幕劇，而這段歷史的舞台，早由西班牙人帶頭發動的殖民冒險活動中所搭建。

1492年，哥倫布抵達他以為是「印度群島」的地方，不論他的初衷為何，都對當地已繁盛發展八百多年的民族生活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壞。現代學者將這些加勒比海地區的居民稱為泰諾人；大量居民流離失所，又因患上

疾病而死亡，並被迫在礦山和農場裏做苦工，為滿足殖民利益提供勞動力。奴役原住民的行為在西班牙社會引起了道德爭議，然而，早在 1500 年就被帶到加勒比海地區接受奴役的西非人卻沒有引起類似的爭議，他們提供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取代日漸減少的原住民——原住民不管如何都被認為是叛逆、不服從或不可靠的工人。

在這個時期，英國並未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先行者，而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區殖民的失敗，導致當地人民和文化幾乎全被抹去——縱然英國和其他國家隨後接替了西班牙的位置。無論各國扮演了甚麼角色，希格曼（Higman）說：「到了 17 世紀初，歐洲殖民活動已將加勒比海島嶼變為一片空白畫布……原本由泰諾人高度耕作的土地，正被雨林重新征服。」¹

第一幕：奴隸與蔗糖

從英國的角度來看，加勒比海地區的故事，始於那片空白的畫布以及西班牙勢力的衰落。正是這種雙重契機，讓英國和其他有意成為殖民列強的國家得以首先在那些實際上被舊有大國所忽視的較小島嶼上取得立足點，並在那裏啟動了所謂的「蔗糖革命」——即發展農業、貿

易和利用奴隸勞動，這些發展緊接早期的失敗殖民主義，卻與之不同，加勒比海地區相繼成為新興殖民列強的巨大財富來源。

隨着英國在 1625 年在巴巴多斯建立殖民地，以及在 1655 年收購牙買加，英國走在發展種植園管理制度的前列，以滿足蔗糖業對勞動力的渴求，並建立了一套殘酷的生產與加工體制，將西非奴隸勞動力的剝削推到極致。最初，被奴役的勞工通常都是由其他國家購買並運到英國。但即便英國一開始並沒有參與這場人口販賣，她很快就迎頭趕上。到了 17 世紀中葉，以及隨後的二百年間，英國在販賣非洲人到自家以及其他國家蓬勃發展的種植園這方面，居於領先地位。

供應和使用是這盤髒生意的兩面。

在供應方面，英國雖然起步相對較遲，但在 1807 年大英帝國廢止奴隸貿易之前的大半個世紀，最終成為販賣被奴役人口的主要參與者。早在 1560 年代，英國的冒險家——如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就在非洲西岸帶領奴隸獵隊；在 16 世紀初，各種公司相繼成立，並獲得皇家特許經營所謂的「畿內亞」貿易。17 世紀末、18 世紀初，這些公司的繼承者在這些基礎上繼續發展，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在 1714 年至 1739 年間從事這一貿易，運送了超過 34,000

人。除了這些官方支持的企業之外，主要在倫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經營的私人商人也開始主導這盤日益增長的生意，在廢除奴隸貿易之前，利物浦是世界上主要的奴隸貿易港口。² 在高峰時期，每年約有 43,500 名被奴役的人由英國船隻運送。四百多年間，大約有 1,250 萬非洲人被運送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可能有 25% 的「貨品」（英國商人對這些非洲人的稱呼）是由英國船隻運送的。

即使在普遍不批判奴役制度的古代世界，人們普遍蔑視奴隸商人，到了 18 世紀亦然。奴隸貿易顯然是一種粗暴與殘酷的交易。英國商人很少遠離自己的船隻，而他們從當地供應商購買的被奴役人口，有時來自相當遙遠的地方；有的可能是戰俘，有的或是被綁架，也有的則因為懲罰或償還債務而被奴役。他們很多在抵達海岸、被販運之前已經死亡；也有很多死在惡名昭彰、運送他們到美洲的「中間航程」（Middle Passage）上，早年，可能多達 25% 的人在航程中死去，到了 18 世紀平均下降到 10%。³ 這段通常持續四至六週的航程，對那些被鎖在黑暗骯髒甲板下的人來說是恐怖的歷程；對於甲板上的人來說則充滿恐懼。船員可能會死於在他們所運送的人中肆虐的疾病，也害怕被奴役者起來反抗；故奴隸船上的大砲是指向甲板的，而不是海上。

那些在航程中活下來的人可能會在碼頭上被賣掉，對自己的前路命運一無所知。儘管經歷種種苦難，此前他們仍和家人、朋友或族群保持聯繫，但此刻這些聯繫很可能會被切斷。奴隸主並不尊重家庭關係（但他們非常注重培養自己的家庭關係），並積極想方設法瓦解族群聯繫，因為他們認為勞工群體中的語言差異，能阻礙怨憤演變為有組織的叛亂。

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恐怖「中間航程」，激發了第一次廢奴運動。早期的倡議旨在改善奴隸船上的條件，例如威廉·多爾本爵士（Sir William Dolben）於 1788 年提出一項私人議案，試圖規定奴隸船上可搭載的被奴役者人數，並規定在航程中必須有一名外科醫生隨行。這項議案最終勉強獲通過立法，但卻遭到所謂「西印度利益集團」（West Indian Interest）反對，並在上議院經歷無數次修訂，但在 1807 年廢除之前，奴隸貿易依然繼續，殘酷程度從沒減輕。而所謂的廢除，僅是廢除跨大西洋的人體貿易。學者估計，在第一次廢奴後的二十五年，直至第二次廢奴，即廢除奴隸制度本身之前，估計有約兩萬名被奴役者在各島嶼間被買賣，而殖民地內部的交易則持續不斷。⁴

若說供應方的情況已夠悲慘，那麼那些被運送到彼岸的人（這樣的稱呼似乎再貼切不過），他們被使用的情況，也就只是其恐怖經歷的延續。早期英國殖民主義依

賴來自英國的契約勞工，通常是同意服務數年的年輕人，也許期望在服務結束後自力更生。但甘蔗種植極為耗費人力，種植園主很快就轉而使用奴隸勞工，因為奴隸更能穩定地滿足勞動需求。契約勞工比奴隸昂貴（契約勞工的服務年限固定），而且英國內戰後人口減少，剩餘勞力難以尋覓，也更難吸引他們前往殖民地，尤其是往甘蔗種植園工作。

這些種植園的工作非常艱苦，條件惡劣，被奴役者的人生通常痛苦而且短暫。

從種植到收割，蔗糖生產需要繁重而密集的勞力。清理土地、種植新作物的工作，只有體力最強的人才能勝任，但十四個月後的收割期，才是勞動力需求最大的時候。甘蔗割下後很快就會變壞，因此工人白天辛苦收割勞動之後，還得在晚上到工廠工作，碾碎甘蔗莖、熬煮甘蔗汁、最後製成原糖。有些工序需要相當的知識和技能，有些工作則極為危險——灼熱的糖漿會造成灼傷，而機器壓輪壓碎的不僅僅是甘蔗莖。所有的工作都讓人筋疲力竭，對大多數工人來說，最終更令他們衰弱不堪。

眾所周知，多達三分之一新到地殖民地的工人會在首年或首十八個月內死亡，這段期間被稱為「適應期」。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早逝是整個勞動人口的常態。奴隸主經常抵制針對種植園和工作條件的任何規範，堅稱財產

擁有人可以自行照顧自己的財產，即使是廢奴主義者也會被這種看似是常理的說法所誤導。但事實上，從擁有奴隸的經濟效益角度來看，種植園主發現從貿易商人那裏購買新的奴役勞工，較維持現有人口並透過繁衍補充來得更有效率，也更有成效。令人訝異的是，美洲大陸殖民地的奴隸人口早期是靠自然增長來維持的，但加勒比海地區卻並非如此；營養不良、疾病、過勞和高嬰兒死亡率都是其中的因素。因此，「到了 1790 年，為使黑人總人口達到 387,000 人，巴巴多斯、牙買加和背風群島總共從非洲接收了約 123 萬名奴隸。」⁵

提到高嬰兒死亡率，實質上也觸及了被奴役婦女所承受的特殊負擔。婦女從被俘虜到在加勒比海地區被販售的過程中，任何階段都可能與現有子女分離。一旦到達種植園，她們只能冒着遭受日常暴力的風險，來抵抗園主和監工的性侵，而正如下文所述，這種暴行被視為理所當然。⁶ 孕婦無論在工作要求或可能遭受到的懲罰方面，幾乎得不到任何寬待，有些種植園為受鞭打的孕婦在地上挖洞已算是一種讓步，因為通常的做法是將受懲罰的婦女吊起，腳趾幾乎不觸地。⁷ 而婦女能否照顧孩子，不論孩子是如何懷上的，甚至能否存活，完全取決於奴隸主的意願或一時的心血來潮。⁸

廢奴倡議者一直相信，廢除奴隸貿易會改善奴隸的處境，他們認為奴隸主肯定會照顧那些不再容易替換

的財產——這被視為是「常理」。蓋德·休曼（Gad Heuman）寫道：「現實卻大相逕庭」。即使在人體貿易被廢除之後，「除了巴巴多斯和巴哈馬之外，西印度英屬殖民地在 1816 至 1834 年間的奴隸人口未能維持自然增長。雖然各殖民地間存在顯著差異，但在那些以甘蔗種植園為主的地區，人口下降幅度最大」⁹，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仍是常態。

在嚴苛的條件下無休止地勞動，奴隸主知道要維持這種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無所不在的鞭子與殘酷的懲罰，就算按當時的標準來看，這些懲罰也相當殘暴。希格曼的描述極為生動，值得在此引述：

在種植園……鞭打是家常便飯，持鞭者狠狠抽打。將鹽巴、石灰和胡椒塗抹在傷口上的酷刑也時常發生。由於被鐐銬束縛或被沉重的鐵器鎖住，根本不可能逃脫，即使嘗試也將痛苦不堪。被戴上腳鐐或枷鎖會使人動彈不得。個別奴隸主及其僱工常常野蠻虐待被奴役者，這不僅是社會恥辱之外，更增添了錐心刺骨的痛苦。最嚴重的鞭打導致死亡或身體殘障，有些人被迫吞下尿液和糞便，有些則被砍掉四肢或生殖器，或被活埋至頸部。想要藉由恐懼來榨取最大勞動力和利潤的慾望，很容易淪為肆無忌憚的殘暴和虐待。¹⁰

以上種種可以稱之為種植園的日常暴力，但在更特殊的情況和時期，還會產生更極端殘忍的行為。任何沒有給例行懲罰嚇倒或殺害的被奴役者，有可能被賣到另一個島嶼，甚至被賣到南美洲大陸的西班牙殖民地為奴。這種與親友的二次分離是一種沉痛的重擔；如同所有懲罰一樣，其目的除了懲罰當事人之外，更在於阻嚇其他人。公開反抗，或僅僅只是被懷疑圖謀反抗，都會招致無情的報復，其野蠻和殘酷程度幾乎沒有極限。火刑是常用的懲罰手段，而且行刑時間會儘可能延長，以增加其示眾效果。就目前所知，對這些懲罰的唯一限制，就是毫無限制的殘酷想像力。

奴隸貿易為所謂的「種植園」提供人力，但「種植園」這個扭怩的字眼掩蓋了一個事實：惡名昭彰的「中間航程」，其恐怖只是序曲，接續而來的恐怖與航程本身一樣駭人。為避免「種植園」一詞可能帶來任何詩情畫意的聯想，將之稱為「奴隸勞動監獄集中營」或許更為貼切。然而，即使是這樣累贅的同語，也無法完全表達這個在當時極其盛行的體制的全部特徵。一旦我們注意到種植園主偏好購買新運抵的非洲人，而不是維持已有的勞動人口——正如希格曼所言：「加勒比甘蔗種植園殖民地吞噬被奴役的人，永不滿足」¹¹——就會明白，我們需要一個更冗長卻更能達意的新詞：種植園是奴隸勞動監獄死亡集中營。

這整個故事的諷刺在於，那些人被運往加勒比海地區，在田裏工作，而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卻為歐洲人的餐桌提供了甘甜的蔗糖。曾經，糖是一種罕見的奢侈品。但隨着 17 和 18 世紀的發展，蔗糖業革命滿足了更普遍的需求，使咖啡和茶這兩種其他殖民地產品的苦澀味道變得更可口，最終甚至登上了窮人的餐桌，尤其是在英國，加了糖的茶、麵包和果醬成了窮人的主食。

這項貿易規模龐大，利潤豐厚。到了 1700 年，英屬巴巴多斯、牙買加、安提瓜、尼維斯和蒙塞拉特的產糖量幾乎佔了全球出口量的一半；到了 1770 年，加勒比海地區的糖出口量不僅絕對有所增加，在全球總產量中所佔的比例也提高了。到了 18 世紀中葉，糖已成為歐洲貿易中最有價值的商品，雖然為了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而增加產量，導致價格下跌，但在近兩個世紀裏，蔗糖生產為個人及國家均創造了巨大財富。

就個人而言，那些殖民者只要能熬過氣候、疾病和酗酒的挑戰，生活會過得很好。1744 年，牙買加白人的平均財產超過 1,000 英鎊，而他們在英國的同胞卻僅值 42 英鎊。¹² 這些成功的西印度群島殖民者以奢華耀眼的消費聞名。位於威爾特郡的放山修道院（Fonthill Abbey）是牙買加龐大地產的缺席繼承人威廉·湯馬斯·貝克福特（William Thomas Beckford）的宅邸；報紙形容貝克福特為「英格蘭最富有的平民」，而這修

道院也許象徵着奢靡和愚蠢。（該建築非凡的中央塔樓建成後經歷兩次重建，第三次最終倒塌，而貝克福特此時已負債纍纍，被迫在塔樓毀滅前將之出售。）但在西印度群島近二百年的奴隸制期間，貝克福特炫耀性的消費，得到無數人的仿效，只是程度略低一點。在西印度群島上，主要的種植園主以其宏偉的宅邸、龐大的被奴役侍從隊伍、奢華的娛樂活動，給彼此和訪客留下深刻印象，並以最精美的食物和最上等的葡萄酒款待來賓。但正如人們所說，種植園主往往是「不情不願的土生白人」¹³，也就是說，即使他們在加勒比海地區出生，但從沒有真正接受永久居住在群島上的想法。他們通常想要回到「家鄉」，即使那是他們首次造訪。而在回到英國定居後，這些西印度群島人仍以奢華的生活方式和看似無限的財富而聞名。坐落於約克郡的哈伍德宮（Harewood House），至今仍由拉塞爾斯家族（Lascelles）擁有，只是眾多顯赫的府邸之一，將來自奴隸貿易種植園的骯髒財富，轉化為英格蘭鄉村豪宅，體面莊嚴，氣派非凡。

至於蔗糖島嶼對國家財富究竟貢獻有多大，則是更具爭議的問題。蔗糖對國庫的直接貢獻，來自生產商和進口商繳納的稅金，但其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則更為廣泛。如果說糖是整個商業活動的核心，其生產則依賴眾多其他產品、供應及服務。來自英國各地的製成品，從鐵製品、小型武器到布匹，都是在西非被綁架人口貿易中使用的貨幣。運送這些貨物到西非，以及新貨物至西印度群島的船隻，均